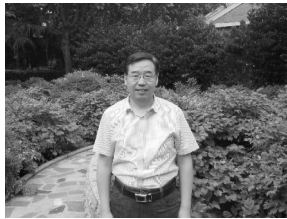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



主持人田建荣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当场表态,宁肯推迟半年招生,“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他说“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史称“8·8讲话”,成为高考恢复的标志。1977年之所以能够突破种种阻力恢复高考,其原点在于1952年确立的新中国统一招生高考制度。而恢复高考和高考统一招生方式的回归,不仅适应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一种理想的重建,也成为全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先导。40年来,高考承载了几代人的历史记忆,同时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今年恰逢高考恢复40周年,我们组织了5篇论文,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追忆历史、分析现状、思考未来,这对于深化高考综合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和现实价值。40年来,我国的高考制度不断改进和完善,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考试招生体系,为学生成长、国家选才、社会公平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40年发展趋势解析》总结了40年高考制度改革历程,论析了高考改革的五大发展趋势。而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发布,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为此,其他4篇论文分别从高校招生自主权、高职院校分类考试、高考专业选择与录取以及“新高考”面临的挑战和路径选择等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希望能够为推动我国考试招生制度继续深化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40年 发展趋势解析

张亚群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历史转折。40年来,适应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需要,高考制度改革呈现五大发展趋势:录取率攀升,招考重心上移;招考类型增多,从选拔性考试向适应性考试转变;命题方式由分省命题回归全国统一命题;招生标准从单一考试走向多元评价;改革自主招生模式,探索人才选拔的新路径。高考制度的历史变革表明,统一考试作为高考制度的主要特征,在公平、高效选拔人才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面临多元评价、阶层平等、区域公平等新的挑战。

关键词: 高等教育; 高考制度; 招生考试制度

中图分类号: G424.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7)04-0005-08

收稿日期: 2017-05-14

DOI: 10.15983/j.cnki.sxss.2017.043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招生考试研究”(12JJD880017)

作者简介: 张亚群,男,安徽庐江人,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考试招生是我国高等教育一项基本制度。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的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简称“高考”),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需要,发挥了重要的教育、政治和社会作用。日本学者认为:“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的建立过程,巩固了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基础,是执政的共产党政权将其行政管理权逐步建立到国家各个领域的发展过程的具体反映。”^{[1]268}然而,在“文革”时期,受“左”倾错误的影响,高考被停废,高等教育蒙受空前劫难。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历史转折。40年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跨入大众化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从历史视角,论析高考制度的性质、功能及发展趋势,总结其利弊得失,可获得有益启示,进一步完善人才选拔制度。

一、1977年恢复“高考”:历史的必然

高校招生是人才培养的起点,关系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平和个人发展,历来为大众所关注。招生选拔方式包括考试和推荐两大类型,其中考试又可分为高校单独考试和统一考试(或联合考试)。“高考”属于全国统一考试,它具有多重属性,受特定时期教育政策和教育发展状况等因素影响。

从考试的社会属性来看,高考适应了社会分工的要求,体现国家和社会的意志,具有明显的政治导向。“在一定意义上说,高考招生选拔机制,既是判别特定时期国家教育政策得失的风向标,也是调节教育资源,维护和保障教育与社会公平的合理有效的手段。”^[2]杨学为认为“就其本质而言,高考是由国家主持的,对年轻一代完成基础教育任务之后,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基础性社会分工。”^[3]由此可见,高考制度在教育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

有研究者从政策角度考察新中国教育演变轨迹指出“到20世纪末为止,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在努力进行了三场不一样的大学生社会来源的革命。”这里的“革命”一词,含义为“只是一场重要的转变,本身并不包含或较少包含政治性的价值

判断”。^{[4]13}具体而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7年(1949—1965)国家通过“出身照顾”为主的各种措施,迅速扭转了大学生社会来源单一的状况,实现了多样性和革命性转变。“十年文革”(1966—1976)开始第二场“无声革命”,以“出身决定”为特色,“推荐入学”与“工农兵学员”制取代了过往大学招生方式。1977年高考恢复后(1977—1999)开始的第三场“无声革命”,以“有教无类”为特征,高考招生不再有身份照顾或限制。相关课题组通过对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招生来源的实证研究,证明了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而且在改革开放后近30年里,精英大学教育具有相当比例的非精英来源。^{[4]24}

纵观中国“高考”的演变历程,有3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1952年、1966年和1977年分别为统一高考制度创立、停废和恢复的标志。其中“恢复高考”发挥了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受政治思想、教育理念、文化传统等因素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1977年恢复高考,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考试是选拔人才的基本方式之一,具有教育测量的功能和自身的发展规律。“文革”时期,以政治凌驾于教育之上,肆意践踏人才选拔和培养的一般规律,对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产生了严重危害。废除高考制度,造成“读书无用”,后门成风,人才“青黄不接”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5]66}“恢复高考”,则意味着“恢复了知识的价值、知识分子的地位”,“恢复了社会流动的渠道”,“恢复了公平地进行社会分工”。^[3]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制度,并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思想表现”的原则,严格考试制度,杜绝“走后门”等不正之风。这些措施对“调动亿万学生和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促进中小学的教育,转变社会风气都产生了积极影响”。^{[6]338}

值得指出的是,在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中,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杨学为指出,粉碎“四人帮”之后,高考迟早是会恢复的。但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前,恢复高考,只有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才能做到。^{[5]381-382}恢复高考,“根本原因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直接原因是培养人才”。^{[7]506}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改革招生制度的重要建议“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8]155}在他的推动下,10月5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改革招生制度的决定。

恢复高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它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声。“恢复高考破除了血统论,不仅为许多因家庭出身被挡在大学门外的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且为后来平反一系列冤假错案打开了制度的缺口。”^[9]随着历史发展,高考的教育与社会价值日益凸显。不仅当年参加高考的“新三级学人”深感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10]序}40年后的今天,一般民众也受到高考的影响。高考与改革开放一路同行,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中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高考 40 年演变的五大趋势

高校招生考试与教育、社会发展存在互动关系。就招生考试实践而论,恢复高考不是简单地恢复“文革”前的招生考试制度,而是适应新的社会条件下学校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变革高考的内容与形式,促进人才培养和社会流动。改革开放以来,整体而言,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变革与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相适应,为各类高校选拔和输送了大批优秀生源。从发展趋势来看,高考在招生数量、考试类型、命题方式、评价标准和招生模式等方面呈现以下特征。^[11]

1. 高考录取率攀升,招生考试重心上移

恢复高考之初,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竞争十分激烈。一方面,由于此前高校停止招考 11 年,社会上积压了大批高中毕业生;另一方面,受“文革”摧残,高等院校办学资源短缺,招生数量少。据有关资料测算,1977—1981 年,普通高考录取率分别为 4.8%、6.6%、5.9%、6%、5.5% (参见表 1),远

低于“文革”前 5 年的高考录取率: 45.4%、27.4%、33.4%、42.1%、46.9%。^{[5]243}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1998 年,高考录取率逐渐上升,高考竞争有所缓解,但就考试竞争的范围和影响而言,依然是高等教育考试选拔的重心所在。^[12]

表 1 1977—1998 年高考录取率统计 单位:万人

年份	高考报考人数 ^①	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	录取率(%)
1977	573.1	27.29	4.8
1978	610.2	40.15	6.6
1979	468.4	27.50	5.9
1980	468.7	28.12	6.0
1981	502.9	27.87	5.5
1982	389.9	31.5	8.0
1983	309.6	39.1	12.6
1984	272.0	47.52	17.5
1985	272.4	61.92	22.7
1986	191.4	57.20	29.9
1987	227.5	61.68	27.1
1988	271.6	66.97	24.7
1989	266.2	59.71	22.4
1990	283.2	60.89	21.5
1991	295.6	61.99	21.0
1992	302.6	75.42	24.9
1993	286.1	92.40	32.3
1994	250.8	89.98	35.9
1995	253.0	92.59	36.6
1996	240.57	96.58	40.1
1997	283.48(实考人数)	100.04	35.3
1998	316.06(实考人数)	108.36	34.3

资料来源:国家教育委员会考试中心编《中国教育考试年鉴》(199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编《中国教育考试年鉴》(1998年、1999年);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中国教育年鉴》(1985—1986),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1988年版;国家教育委员会计划建设司(计划财务局)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87年、1988年),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1989

^① 1980—1985年考生人数含经预选淘汰的考生。1983—1985年新生人数不含干部专修科。此外,各年度高考报考人数与实际考试人数有差异,除了统计年鉴明确标明实际考试人数外,本表一般依据高考报考人数计算录取率。表2同此。

年版;国家教育委员会计划建设司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89年、1990年、1991—1992年、199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至1992年版;国家教育委员会计划建设司编《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1992年、1994年、199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1996年版;杨学为著《中国考试改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新华网等媒体发布历年高考人数统计。

1999年我国开始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战略,高校连续大扩招,高考录取率大幅上升。10年“大扩招”,全国高考平均录取率由46.9%升至2009年的65.7%。2015年高考录取率达到78.3%(参见表2)。2002年与1997年相比,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9.8%上升到15%,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1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达37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0%,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表2 1999—2015年高考录取率统计 单位:万人

年份	高考报考人数	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	录取率(%)
1999	340.4	159.68	46.9
2000	388.5	220.61	56.8
2001	453.5	268.28	59.2
2002	520.0	320.50	61.6
2003	582.29(实考人数)	382.17	65.6
2004	729.45	447.34	61.3
2005	876.81	504.46	57.5
2006	949.83(统考880)	546.05	57.5
2007	1011.77	565.92	55.9
2008	996.66(秋季统考类考生)	607.66	61.0
2009	973.98	639.49	65.7
2010	921.98	661.76	71.8
2011	896.64	681.50	76.0
2012	876.08	688.83	78.6
2013	877.63	699.83	79.7
2014	939.00	721.40	76.8
2015	942.00	737.85	78.3

资料来源: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编《中国教育考试年鉴》(2004—2014),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至2015年版;田胜利主编《中国高考年鉴》(2004年·首发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新华网等媒体发布高考人数统计;教育部发布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高等教育大众化为广大学子提供了更多的升学机会,但高考竞争仍然激烈。考试竞争的目标,从精英教育时代的考上“大学”演变为考上“重点

大学”和“热门专业”。同时,受高等教育大众化推动,研究生教育招生规模随之扩张,报考研究生人数急剧增加。虽然一些考研者主要出于对学术研究的爱好与追求,但也有不少考生主要受就业压力和家庭推动等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后者更多地反映了“重术轻技”“读书至上”等传统观念以及“名校情结”、从众与攀比心理的潜在作用。此外,部属重点高校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分布的不均衡,也是导致“考研热”的重要因素。^[12]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招生考试重心不断上移。

2. 高考类型增多,从选拔性考试向适应性考试转变

精英时代的高考,从专科学校到研究型大学只有一种类型,这就是全国统一的学术型高考。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这种人才选拔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高考科目及形式改革势在必行。20世纪90年代,国家开始在少数省区试点专科招考与本科招考相分离的制度,但因缺少配套改革措施,这一招考政策难以持续实行。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高校分层分类增多,迫切需要改革单一的高考制度。为此,教育主管部门积极推动建立新的高职院校招生制度。在新一轮高考改革中,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其重点在于探索“知识+技能”的考试评价办法,开放多种入学形式,完善相关改革举措,降低高等职业院校入学门槛。河南省从2008年就已经在中职学校中推行免试注册入学,应届、往届初中高中毕业生可以持初中或高中毕业证书到中职学校注册入学,不需要再通过考试;2010年开始试点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像江苏、福建等省市步伐迈得更大,已经建立高职院校注册入学制度。

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文件,提出全国高考改革方案的大框架和总体目标,到2020年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高职院校与普通院校分类考试更适合现代社会对人才选拔的要求。笔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真正落实这项改革举措,需要加强四方面的配套工作。首先,应提升对技能型人才的价值及选拔

方式改革意义的认识,改变根深蒂固的“重学术轻应用”观念,营造人才选拔的适宜环境。其次,要精心组织技能型高考,在命题和选拔标准等方面,保障高职院校招考的信度与效度。三要加强高职及应用型本科学科建设和教学实践,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四要重视使用技能型人才,为高职院校招生提供就业保障。^[13]

浙江、上海作为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在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方面已出台新的举措。职业技能考试作为高职招生综合改革第一个实施项目,将逐步代替原有的专业理论考试。上海仅报考专科高职志愿的学生,只计语文、数学、外语 3 门统一高考成绩。浙江对报考高职院校的考生实行单独考试招生,将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相结合。2014 年已实施 9 大类职业技能考试,2015 年再开考计算机类等 6 大类。自 2015 年开始,浙江高职自主招生逐步向高职提前招生过渡,实行一档多投、考生高校双向选择。部分高职院校在单独考试招生中试行四年制高职教育,依托高职优质资源,联合本科院校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 5 所高职院校、自动化等 6 个专业实行招生试点,招生计划由合作本科院校单列。

3. 由分省命题回归以全国统一命题考试为主 维护考试公平

自 1952 年建立统一高考制度后,除了 1958 年实行分省单独命题外,均实行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恢复高考以来,高考模式几经演变。1977 年、1978 年由于高考筹备仓促,实行分省命题考试。此后,1985 年上海高考自主命题。2002 年北京实行自主命题。2004 年起,天津、辽宁等 14 省市相继自主命题。另一方面,随着高考命题权下移及“异地高考”问题的凸显,分省命题的弊端受到社会大众的尖锐批评。

分省命题改革的动因包括三方面:一是适应本地经济、教育、文化发展需要,发挥地方教育优势;二是应对高科技作弊的威胁,分散高考泄题风险;三是适应基础教育领域新课程改革的要求。分省命题与全国统一命题各有其适应性。在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体制下,分省命题打破全国高考一

份卷的格局,促进了命题方式多样化。这有利于高考命题因地制宜,适应本省市教育、文化发展需要,推动了命题省市与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合作与竞争。另一方面,受主客观条件制约,分省命题考试也衍生一系列弊端。总体而言,分省命题得不偿失。一些考试技术研究薄弱、命题队伍建设滞后的省区,实行分省命题降低了高考的信度与效度,对考试公平及中学教学产生负面影响。同时,高考命题权分散,增加了保密难度和泄题风险。分省命题还导致各省市高考成绩缺少可比性,加剧了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难度。^[14]

为了纠正分省命题的弊端,近年来一些省份开始重新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2016 年除了京津沪、江苏、浙江 5 个省、市外,全国 26 个省、市均采用全国卷,其中,四川省分步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2017 年起该省普通高考各科将全部使用全国卷。为了使残疾人考生平等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教育部于 2015 年制定并实施相关文件,为残疾人平等报名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在此基础上,2017 年进行了修订完善,产生了积极的教育影响。

与此同时,教育部开始调整和规范高考加分政策,取消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只保留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考生、烈士子女等 5 项全国性加分项目。2015 年 1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将高考作弊入刑定罪。这些举措促进了考试公平,对于维护国家教育考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5]

4. 高考招生从单一考试走向多元评价,引导基础教育全面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高考选拔生源主要依据统一考试成绩。这种选拔方式在保障考试公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有效地选拔出大批优秀人才。另一方面,毋庸讳言,单一的考试取才也存在片面性,尤其是对中小学教育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新的高考制度将实行“两依据、一参考”,招生院校依据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高中阶段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这是当今高考改革的亮点,也是难点所在。

按照国务院提出的全国高考改革方案的大框架和总体目标,各省根据实际,制定具体的高考改革方案。至2017年初,已有30省(市、区)公布高考综合改革方案。上海、浙江作为首批试点,2017年全面实行新高考。各省高考综合改革方案的实施步骤略有差异,而其总原则和主要内容是一致的,体现了国家共同的招生政策导向。

当今高考综合改革遵循“加强统筹规划,积极稳妥推进”的基本原则,正在循序渐进,分批实施。各省市普遍实行“3+3”高考新模式;文理不分科,发挥“统考”与“选考”的各自优势,促进基础教育全面发展。高考语文、数学、外语每门满分150分;选考科目按等级赋分,具体分值及等级略有差异。高考外语及高中“学业考”选考科目提供一年两次考试机会,扩大考生的选择性;高校招生录取实行“考生总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的评价方式,体现了“多元评价”的教育要求。^[15]

5. 改革自主招生模式,探索人才选拔的新路径

在高校考试招生改革中,自主招生改革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进入新世纪后,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和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教育部开始推动自主招生改革试点。2003年首批22所部属大学试行自主招生,此后试点范围不断扩大。经过十多年不断探索,高校自主招生走过了从单独招考、联合招考,到高职院校与学术型高校分类招生,以统一高考为基础,进行综合评价的不同路径。

从招生政策来看,高校不断调整高校自主招生的标准及选拔办法。2005年教育部要求试点院校,通过举办笔试、面试等方式,“切实选拔综合素质高、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强的人才”。2010年,北京大学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增加招考互信,降低选拔成本。2011年部属高校自主招生要求“选拔学科特长以及全面发展且具有创新潜质的人才”。2013年4月,教育部制定《关于进一步深化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将自主招生定位于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16]

与统一高考相比,自主招生标准多元、灵活性

大,有利于选拔不同类型的人才,但其可比性小,公平性弱,社会认可度低,在考试公平以及区域公平等方面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前些年,一些试点高校在招生标准的设定、自主选拔环节特别是面试环节存在一些漏洞,同时缺乏有力监督,为权力“暗箱操作”、徇私舞弊留下了活动空间。^[17]为了克服弊端,2012年12月教育部发布文件,加强和完善高校自主招生制度建设,加大对违规招生的惩处力度。2015年教育部规定,取消高校联考,自主招生改在高考后举行,通过考试等方式,结合高考成绩,择优录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属院校取消了推荐学校限制和推荐名额,由学生自愿报名,以保障考生公平竞争机会和招生区域公平。

自主招生是高校招生考试的发展趋势。从历史和国际比较来看,现阶段国内高校还需要不断扩大招生自主权,以适应创办高水平大学的需要,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在招生标准上,研究型大学需注重选拔具有宽广学术基础、全面发展的人才,高职院校应侧重选拔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人才。推进自主招生改革,需要进行配套改革。既要加强法治建设,健全高校考试招生规章制度,使考试与招生各司其责,保障考试招生的公平公正;也要依据不同类型高校人才选拔的要求,制定正确的自主招生政策,推动自主招生走向多元化;同时,应构建多层次诚信体系,为自主招生提供社会保障。^[18]

三、反思与启示

时移世易,高考制度在变革中不断完善。40年来,不仅高考的科目、内容、录取方式几经变革,其实施的社会结构、经济环境、基础教育生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高考功能的有效发挥。高考制度的历史变革表明,统一考试作为高考制度的主要特征,在公平、高效选拔人才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都与高考招生制度的积极功能密切相连。高考激发起全社会的求知欲望,维系着社会的公平正义,选拔和培养大批人才。然而,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新的社

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下, 高考制度也面临教育平等、区域公平、人才多元评价、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等严峻挑战。

就高考的教育测量功能而言, 全国统一命题考试具有可比性, 能够降低考试成本, 提高考试的质量与效益, 有利于客观、公平选拔人才。正因为如此, 一度盛行的分省命题考试, 纷纷回归全国统一命题考试; 大学自主招生也将高考成绩作为录取的重要依据。这些都反映出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价值。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经济、教育环境的差异, 基础教育发展不平衡, 城乡教育差距扩大, 削弱了高考的公平性, 加剧高考区域不公平、社会阶层固化。当今高考虽然保持考试公平的基本特征, 但参加高考的对象已发生了诸多变化。恢复高考最初几年, 普通中学和农村考生还能凭借高考“分数”考上重点大学; 随着重点中学的发展和城乡教育资源的分化, 普通中学和农村考生的高考竞争力越来越弱。由此导致重点高校农村生源减少, “寒门难出贵子”。学术界对此已有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 社会强调效率和发展远胜过公平与平等。研究发现, 在教育领域内随之发生了两方面的重要转变: “一是大众教育模式向精英化教育模式的转变, 这种转变对于农村和贫困地区以及城市贫困家庭和父母文化水平较低家庭的子女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他们往往成为被淘汰的对象, 辍学率的上升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二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教育的产业化’), 教育的市场化导致了地区之间和不同家庭经济背景之间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教育领域的这些转变, 都可能持续影响到今后考试招生环节“无声革命”的走向。^{[4]14-15} 这就启示我们, 必须重视社会经济、教育环境变化对高考公平的影响, 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

为了缩小高考招生的阶层差异和区域差异, 促进高等教育公平, 近年来, 国家开始实施各种“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地方专项”等专项计划, 扩大中西部农村考生就读重点大学的比例。这项政策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从长远发展来看, 治本之策在于继续推进东西部地区、城乡之间基础

教育的均衡发展。研究表明, “智力水平在大规模人口中的分布是随机的”就此而论, “只有能够保证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和社会中下层中选择一定比例人才的制度才是科学合理的”。因此, 试图维持精英大学生源多样性, “除了强调考试改革的妥协之外, 更要注意基础教育的全面提高”。这是“更为紧要和更为有意义的工作”。^{[4]264-276-277}

我国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2017年1月19日, 国务院发布《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十三五”规划》, 提出进一步扩大全民终身学习机会, 全面提升教育质量, 教育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民, 人才供给和高校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教育体系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以推动我国迈入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行列。在发展指标上, 到2020年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 毛入学率达到50%。实现上述教育发展目标, 需要进一步完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 必然要求招生评价标准的多元化, 扩大考生的选择性和入学方式的灵活多样性。既要维护考试招生的公平性, 也要注重考试招生的科学性, 提高考试选才的信度与效度, 扩大高考的服务面。

总之, 推进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 必须与教育改革同步进行, 以适应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冲击和人才培养的激烈竞争, 我国加快了各级各类教育的步伐, 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其重要环节。在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 我们既要发扬统一考试的优点, 也应引进多元评价方式, 弥补其不足, 以促进基础教育全面发展, 提升高校生源的综合素质。同时, 大力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更好地发挥考试选拔人才、促进社会流动的积极功能, 为培养创新人才服务。

[参 考 文 献]

- [1] 大塚丰. 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M]. 黄福涛,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 [2] 张亚群. 人才选拔制度的历史转折: 高考恢复三十年省思[J]. 东南学术, 2007(4).
- [3] 杨学为. 30年后话高考[J]. 中国考试, 2007(8: 上半月刊).
- [4] 梁晨, 张浩, 李中清, 等. 无声的革命: 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 1949—2002[M]. 北京: 生

-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 [5] 杨学为. 中国考试改革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6]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 [7] 杨学为. 中国高考史述论(1949—1999)[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 [8] 邓小平. 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M]//邓小平文选: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9] 刘海峰. 高考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 教育研究 2007(11).
- [10] 周勇. 难忘那一年[M]//郑朝卿. 见证30年——纪念恢复高考30年.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7.
- [11] 张亚群. 高考40年: 精英如何变成大众[N]. 南方教育时报 2016-06-10(14).
- [12] 张亚群. 大众化阶段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演化趋向[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7(1).
- [13] 邓晖. 高考“一分为二”能否叫好又叫座[N]. 光明日报 2014-03-24(7).
- [14] 张亚群. 分省命题的利与弊[N]. 光明日报 2013-06-19(14).
- [15] 张亚群. 高考综合改革: 改什么, 怎么改[J]. 时事报告 2016(6).
- [16] 张亚群. 高考改革三大政策导向辨析[J].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1).
- [17] 张亚群. 北大清华自主招生改革应该点赞[N]. 中国教育报 2015-03-23(2).
- [18] 张亚群. 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还需综合考量[N]. 中国教育报 2015-03-07(2).

[责任编辑 何菊玲]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Over in the Past 40 Years

ZHANG Ya-q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Scienc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The restoration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in 1977 was a major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Forty years,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presents five major trends: the admissions rate climbed and its focus moved up; admission type increased, tests transformed from selective to adaptive; assigning of topics return to national level from the provincial; enrollment standards changed from a single test to multiple evaluation; and reforms are pushed to develop independent enrollment model and explore the new path of talent selection. The history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hows that the unified examination, as the main feature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fair and efficient selection of talents, but also faces new challenges such as multiple evaluation, class equality and regional fairness.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enrolment examination system